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

上

术活动60周年文集

SHEQUYANJIU

YUSHEHUIFAZHAN

JINIANFEIXIAOTONG

JIAOSHOUXUESHUYUODONG

60ZHOUNIANWENJI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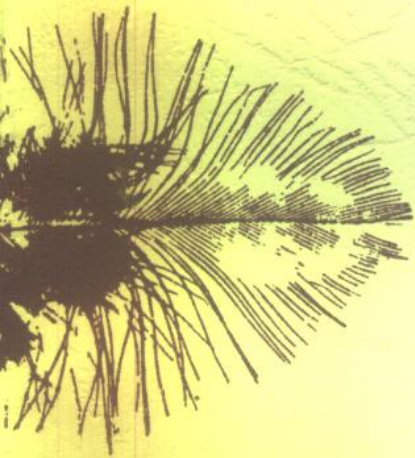
主 编 / 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 / 邱泽奇 王铭铭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1卷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

中

术活动 60 周年文集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SHEQUYANJIU

YUSHEHUI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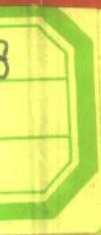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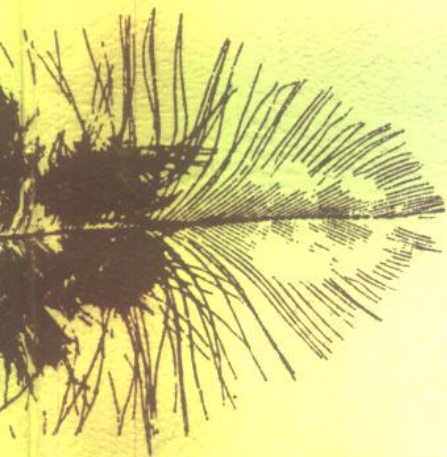
JINIANFEIXIAOTONG

JIAOSHOUXUESHUIHUODONG

60ZHOUNIANWENJI

主 编 / 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 / 邱泽奇 王铭铭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1卷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

下

术活动60周年文集

SHEQUYANJIU

YUSHEHUIFAZHAN

JINIANFEIXIAOTONG

JIAOSHOUXUESHUYUOD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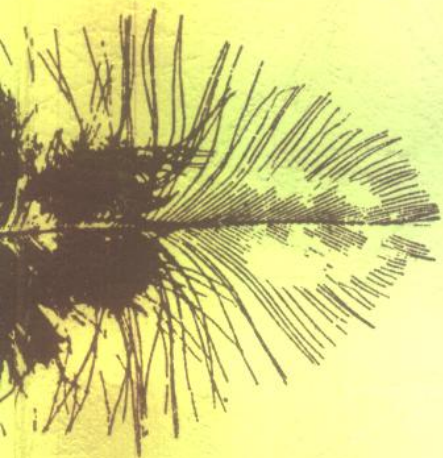
60ZHOUNIANWENJI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主 编 / 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 / 邱泽奇 王铭铭
◎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1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一卷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文集

（上）

主 编：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邱泽奇 王铭铭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1996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一卷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 周年文集

（ 中 ）

主 编：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邱泽奇 王铭铭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天 津 1996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一卷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 周年文集

《 下 》

主 编：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邱泽奇 王铭铭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天 津 1996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 周年文集

主 编：潘乃谷 马 戎

执行主编：邱泽奇 王铭铭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375 印张 2 插页 136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01—02556—2/Z·66

定 价：68.00 元(上、中、下)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学术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 星
高丙中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出版说明

自1985年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发展跨学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十余年来,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指导下,我所教学与研究人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与经验探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发展类型研究、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当代文化变迁以及乡村教育、环境、人口等关系到重大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的领域里从事研究工作。在各个专题的研究中,我们注重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发挥研究人员的不同学科专长和多学科的交叉,初步展示出自己的学术风格。这一风格的基点是费孝通教授几十年来提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并举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

在从事大量实地调查和专题研究之后,我所教学与研究人员深感有必要使学科建设和理论探讨进一步系统化,以便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论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自1996年起以本所为基地编辑出版“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为上述努力提供一个学术园地。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为社会学人类学学术丛刊,由我所研究人员组成“论丛学术委员会”,在启动之后,计划每年出版一至两卷。适逢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本论丛学术委员会决定将纪念文集列为第1卷。这1卷体现了我所的基本研究特点和学术取向。在此之后,“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将着重刊载包括以下内容的研究论文:(1)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2) 在具体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人类学分析; (3) 人类基本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理论与经验探讨; (4) 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仪式象征体系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5) 社会-文化与经济过程和生态体系的关系研究; (6) 族群之间社会文化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7) 少数民族与少数者人群研究; (8) 社会与文化变迁、发展、现代化历程的分析; (9) 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亦拟收编出版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述评、学术专题论文、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名著书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动态、社会学人类学文献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以费孝通教授为学术指导,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与教学人员负责编辑。本论丛的基本目标在于:展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及有志于共同事业的其它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图创立规范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强调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使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能够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并促使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立足于国际学坛。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学术委员会

1996年5月

序

开风气 育人才

费孝通

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会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仁们一起鼓劲自励。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10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仁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吴文藻老师的生平和主要论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里已经有了叙述和重刊，我

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中检出一些要点，略作诠释。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只有了解了65年前中国各大学里的社会学系的实情，才容易理解吴老师当时初次踏上讲台授课时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录里“传略”所引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接着他深有感慨地总结了一句，“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我是193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有缘见到吴老师初次上台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的一个

学生。我从中学时就在教会学校里受早期教育，是个用舶来物滋养大的学生。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我当时认为是怪事的这个印象，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当时我会有这种印象才真是件怪事。这件事正好说明了这65年里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这个变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领会65年前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和他们在这65年中经历的苦乐。

现在来讥笑当时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65年前的历史条件里，要想把当时的学术怪胎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却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吴老师当时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史。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涵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从65年前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看来会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过是纠正在中国大学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经过了一个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课程之外，在中国学校里用本土语言来授课已成了常态，但是，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谈不上是正宗。吴老师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经过时，

还是个应该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宗旨,实质上是继承和发扬吴老师早年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这个社会 and 人文科学中国化问题牵涉到对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大约60年前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所办的“社会研究”周刊,就曾经展开过一番“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之争。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知识而追求知识,固然也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是我在这场辩论中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面,因为我觉得“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吴老师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把英国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在功能学派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类通过积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之上。知识是人文世界的基础和骨干。学以致用不就是说出了知识对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现在已通行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

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的内容里去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所必要走的初步工作。我记得30年代的初期当时的社会学界在这方面已逐步成为普通的要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

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在当时的教会大学里偏重的是第二种倾向。开始引进这方法的还是在教会大学里教书的外籍教师，其中大多不懂中国话，雇佣了一批中国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问卷，到中国人的社会里去，按项提问，按表填写，然后以此为依据，加上统计，汇编成书。这在当时的社会学里还是先进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学的J. L. Buck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开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调查，不能不说是做贡献的。这个方法不久就为我国的社会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并加以改进，适应中国的情况。最著名的是当时在平民教育会工作后来转入清华大学的李景汉教授。他在河北定县和北京郊区一个农村的调查首开其端，接着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也开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镇的社会调查。这些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进程中有它们重要的地位。到了抗战时期在社会调查工作方面，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曾经结合经济学在滇池周围各县进行过人口调查，由陈达教授给予了指导，方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形成了一种传统，为我国人口学奠定了基础，则是后话。

吴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中国史料来填写西方的理论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Robert Park教授来校讲学，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吴老师很敏捷的发现了这正是改进当时“社会调查”使其科学化的方法。他从Park教授得知这种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中吸收来的，而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已用当时所谓“田野作业”的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吴老师抓住这个机遇，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并且决定跟着追踪进入社会人类学这

个学科去谋取“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又回想起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系里在我们这批青年学生中掀起的派克热。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京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际。这正是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我们用理论去结合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就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当Park教授讲学期满返国时，我们这辈学生出版了一本《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他作纪念。可惜，这本书我到现在已找不到。

就在那年暑假，这一群青年学生就纷纷下乡去搞所谓社会学的“田野作业”。吴老师则正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去培养出一批能做“社会学调查”的学生，他知道要实现他改革社会学的事业，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论说，必须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效益去奠定这项学术改革的基础。能做这种“社会学调查”的人在哪里呢？当时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这种人才。所以吴老师就采取了现在已通行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他在1935年请来了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Radcliffe-Brown到燕京大学讲学。又在燕大的学生中挑出一部分有志于做这项工作的人去学人类学。我就是其中之一，由吴老师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人类学。其后又为李安宅、林耀华等安排出国机会到美国学文化人类学。吴老师自己利用1936年休假机会去美国和英国遍访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我在该年从清华毕业后得到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在伦敦由吴老师的介绍才有机会直接接受马林诺斯基的指导进行学习。

我提到这些似乎是私人的事，目的是要点出吴老师怎样满怀热情地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费尽心计。我在这里引一段冰心老人在地“我的老伴”一文中所引吴老师自传中的一段话：

“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现在李安宅已经去世，林耀华和我今年都已到了85岁，这几个人就是吴老师这段话里所说的那些学生，都是吴老师亲自安排派出去学了人类学回来为“社会学中国化”工作的人，也是吴老师开风气、育人才的例证。

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日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6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所以有它的个性（即本土性），所以在研究时不应照搬一般化的概念。早期西方的人类学是以“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这就是他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引进人类学方法的用意。同时他把这两门学科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

吴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为实现他提